

琴行是老上海繁华街市的一道独特景观。探究它的发展轨迹，对于从一个侧面了解上海这座文化大都市的形成不无帮助。

1843 年上海开埠，带来了许多中国之前从未出现过的经济和文化现象，琴行便是其中之一。就在上海开埠的那一年，由英国商人投资经营西乐的谋得利琴行在南京路正式开业。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家经营西乐的琴行，专营英国生产的钢琴、风琴和供教堂用的管风琴。“新式八音琴，本行新到大小八音琴，内敲钟鼓，其音甚妙，以及号筒、战鼓、洋

前些日子，读到过一篇关于一家粥面店的“最后一天”的报道，印象较深。那篇报道大约有一两千字，我将其“微缩”成下面一小段文字，与读者诸君分享：

地处香港铜锣湾骆克道的“利苑粥面”，是一家经营了 42 年的老店，遐迩闻名。由于铺面租金高涨，店铺老板郭先生感到难以为继，决定忍痛歇业。今年 1 月 29 日，是这家老牌食肆的“最后一个营业日”。上午开门前已有两百多名顾客排队，许多人排了一个半小时才吃上，有些人是特地从大老远的地方赶来的。后来候吃的队伍越排越长，原

拟午夜 12 点半打烊，因顾客实在太多，直到凌晨 2 点才关门。关张之后人们仍不愿离去，店主、员工与顾客彼此都依依不舍，纷纷合影留念。

这真是古今食肆中的一则佳话，也是非常难得的教人为之动容的场面，还是彰显饮食文化的凝聚力的一个活标本。

香港市民之所以留恋和怀念“利苑粥面”，因为人家有风味独特的云吞面、生滚猪润粥、粿条等美食，且讲诚信，多年来都是店主郭老板亲手包云吞，凡是经他打理、过问的，材料、品质都有保证。食肆的立足之本，就是拿出价格公道的好吃的东西，这才是硬道理。回眸往昔，在苏、浙、沪以至全国的好些城市，过去均不乏各种老字号的饭店、粥店、面店、点心店（有些还是历史悠久的百年老店），而且都曾经做出过各具特色的创牌的粥饭面点，它们也都是食客如云，门庭若市，与香港的“利苑粥面”相较，可以说是毫不逊色，有的甚至比它影响还要大。好多老年食客谈起它们来，如数家珍，所不同的，只不过是有些名气大一点，有些名气小一点。

民以食为天。众多关乎民生的食肆本应继往开来，搞得比先前更有起色才对。令人痛惜的是，由于政策失误、道德滑坡、传统文化遭到破坏、厨艺传承的部分断层、环境污染造成原材料变异等诸多因素，致使那些曾经贡献过好味道和美味乃至独特风味的食肆，那些给人们生活带来美好回忆的食肆，那些“各领风骚”的食肆，渐渐地一家一家地消失了。有的虽然名称仍在，招牌依旧，并且还标榜“正宗”、“老牌”，但已名存实亡，配方、制作工艺、食材均与原先的老店不搭界了，端出来的东西业已不是原来的东西，离原汁原味差远了。星星还是那颗星星，月亮已不是那个月亮了。而这些，却是《舌尖上的中国》所没有的，是疏忽，还是回避？

我怀念小时候常去的上海滩老城厢的一片粥店，那儿的赤豆粥又香又糯，小碟子里的酱油黄鱼鲜美无比。而我所尊敬的一位九十多岁的老前辈，至今还念念不忘当年某素斋馆的那一碗面筋面。可惜，这些都是“过去式”了。现今中国大陆的任何一家食肆开张，还会有“利苑粥面”那样的“礼遇”吗？！

香港的“利苑粥面”尽管停业，日后尚有可能复业，店主郭先生表示“先休息一段时间，再考虑另觅地方重操旧业”。我们大陆或许消失了的具有种种特色的食肆，消失了的各类传统美味，恐怕再也回不来了。恕我孟浪，将某首流行歌曲的歌词稍微改动了一下：

时光一逝永不回，往“肆”只能回味……

往「肆」只能回味

高低

笛、洋箫等各色乐器俱全……请至英大马路 3 号便是。谋得利琴行启。”从这条刊登在 1894 年《申报》上的广告可以看出谋得利琴行经营的乐器品种之丰富。

老上海的琴行

朱争平

1875 年，在清朝官吏周孝堂的资助下，英国商人又在南京路开办了罗办臣琴行。此后，葡萄牙籍的印度商人又在南京路开设了来瑞罗琴行。这个琴行不仅经营各种西洋乐器，还经营乐谱。当时全

国各地音乐团体、音乐院校都向它采购，可谓是中国第一家西洋乐器和乐谱的专业商行。

19 世纪末，除了几家西洋琴行外，上海出现了一批国人自己开设的琴行。这些华人琴行的创始人大多是原谋得利琴行的技工，用在谋得利学得的技术和经营之道开办自己的琴行。原谋得利工人黄祥兴等人于 1890 年在现汉口路福建中路开办的祥兴琴行是国人开办的第一家西洋乐行。此后，原祥兴琴行工人程定国在四川北路开办了永兴琴行，原谋得利工人顾之荣等人在闸北开办了精艺琴行，贺春生等人开办了上海琴行。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上海经销西洋乐器的琴行达数十家。

琴行催生了上海近代乐器制造业。谋得利琴行因华工劳动力廉价和“华界”地价便宜，于 1870 年在闸北太阳庙路宝山路兴建了谋得利钢琴厂，这是中国第一家钢琴厂。上世纪 30 年代前后，谋得利钢琴厂生意兴隆，全厂有 200 余工人，月产钢琴超过 100 架，占上海钢琴市场总量的 50%。接着，罗办臣、永兴、精艺等琴行也都纷纷开设钢琴厂，并拥有了自己生产的品牌钢琴。永兴琴行的施特劳斯牌钢琴、精艺琴行的精艺牌钢琴、上海琴行的莫扎特牌钢琴、鸣凤琴行的华格纳牌钢琴、美惠琴行的霍夫曼牌钢琴、罗办臣琴行的鲁滨逊牌钢琴等，都是当时颇受市场青睐的品牌钢琴。由此，使上海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小作坊式的传统民族乐器业转向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乐器制造业。建国后成立的上海钢琴厂就是以这些琴行工厂为基础组建的。

琴行助推了近现代上海音乐教育。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变法维新思想影响下，创办新式学堂的现代教育潮流兴起，代表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学堂乐歌应运而生。当

说起我和古琴的缘分，应算是极“非典”的，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古琴是在美国波士顿。说起来惭愧，一直在外企工作，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任何接触。在美国时去一个华人朋友家拜访，在书房里看到一个没见过的乐器。问这是什么，答为古琴。好奇拨动了一下琴弦，“咚”的一声，回想起来就是那一声开始结下了与古琴不解的缘分。

这“咚”的一声似乎有魔力一般，始终在耳边环绕，久久不能忘怀。回来之后查了资料才知道，古琴是中国最早的弹拨乐器，琴棋书画里的琴指的就是古琴。也是孔子学文王操于师襄子、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的那个琴。

古琴的样子很简单，简单到看似就是在在一块一米多长的

校都向它采购，可谓是中国第一家西洋乐器和乐谱的专业商行。

19 世纪末，除了几家西洋琴行外，上海出现了一批国人自己开设的琴行。这些华人琴行的创始人大多是原谋得利琴行的技工，用在谋得利学得的技术和经营之道开办自己的琴行。原谋得利工人黄祥兴等人于 1890 年在现汉口路福建中路开办的祥兴琴行是国人开办的第一家西洋乐行。此后，原祥兴琴行工人程定国在四川北路开办了永兴琴行，原谋得利工人顾之荣等人在闸北开办了精艺琴行，贺春生等人开办了上海琴行。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前后，上海经销西洋乐器的琴行达数十家。

琴行催生了上海近代乐器制造业。谋得利琴行因华工劳动力廉价和“华界”地价便宜，于 1870 年在闸北太阳庙路宝山路兴建了谋得利钢琴厂，这是中国第一家钢琴厂。上世纪 30 年代前后，谋得利钢琴厂生意兴隆，全厂有 200 余工人，月产钢琴超过 100 架，占上海钢琴市场总量的 50%。接着，罗办臣、永兴、精艺等琴行也都纷纷开设钢琴厂，并拥有了自己生产的品牌钢琴。永兴琴行的施特劳斯牌钢琴、精艺琴行的精艺牌钢琴、上海琴行的莫扎特牌钢琴、鸣凤琴行的华格纳牌钢琴、美惠琴行的霍夫曼牌钢琴、罗办臣琴行的鲁滨逊牌钢琴等，都是当时颇受市场青睐的品牌钢琴。由此，使上海始于清乾隆、嘉庆年间小作坊式的传统民族乐器业转向规模化、产业化的现代乐器制造业。建国后成立的上海钢琴厂就是以这些琴行工厂为基础组建的。

琴行助推了近现代上海音乐教育。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变法维新思想影响下，创办新式学堂的现代教育潮流兴起，代表中国近代新音乐的学堂乐歌应运而生。当

说起我和古琴的缘分，应算是极“非典”的，因为我第一次看到古琴是在美国波士顿。说起来惭愧，一直在外企工作，与中国传统文化没有任何接触。在美国时去一个华人朋友家拜访，在书房里看到一个没见过的乐器。问这是什么，答为古琴。好奇拨动了一下琴弦，“咚”的一声，回想起来就是那一声开始结下了与古琴不解的缘分。

这“咚”的一声似乎有魔力一般，始终在耳边环绕，久久不能忘怀。回来之后查了资料才知道，古琴是中国最早的弹拨乐器，琴棋书画里的琴指的就是古琴。也是孔子学文王操于师襄子、伯牙子期的高山流水的那个琴。

古琴的样子很简单，简单到看似就是在在一块一米多长的

《红楼梦》里用了不少笔墨描绘贾府内的时令活动，比如新年围炉庆祝、芒种祭饯花神、中秋赏月听笛、中元祭奠五美……放风筝是春天不可或缺的活动，最能体现女儿们的动态之美，作者自然不吝文字，慷慨地进行大段描写。

风筝的来源有多种说法，有说脱胎自墨子的木鸢，也有说是五代李邕首创的新奇游戏。无论何种考据成立，到了《红楼梦》的成书年代，纸鸢早已成了女子和儿童喜爱的玩具。

大观园里的生活比外头精致十倍，红楼女儿们把玩的风筝自然也是精雕细作的艺术品。传为曹雪芹所撰的《废艺斋集稿》中的第二册，名曰《南鹞北鸢考工志》，描述当时流行的风筝制作，有金碧闪耀，在阳光下焕发奇彩的“蜻蛉乌金翅风筝”，从风筝里能窥见凤凰、美人、蝙蝠风筝的“影子”。有趣的是，书中写

时学堂音乐课和教堂所用的西洋乐器和乐谱大多从琴行购得，有些家境较好的学生也到琴行的琴房练琴。现今上海琴行艺校或琴行音乐培训中心与老上海琴行的音乐教育

有着历史的渊源。始建于 1927 年的国立音乐学院即现上海音乐学院开办之初，16 位音乐教师中有 9 位是授钢琴、小提琴等西乐的。创办于 1912 年的上海美专在中国现代著名音乐教育家刘质平的推动下，专设音乐系并开了钢琴课。琴行则为这些院校的新音乐教育提供乐器和乐谱。

琴行见证城市兴衰。屈指算来，上海琴行已走过了整整 170 年艰辛漫长的历程。在琴行的发展过程中，曾受到战争的影响和建国后政治运动的冲

击。谋得利琴行就因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英与日开战而正式关闭。“文革”期间，上海的琴行几乎消失。改革开放后，琴行在申城迅速复苏，日益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兴旺景象。目前仅金陵东路乐器一条街及汾阳路附近的琴行就达上百家，形成了产业化发展的趋势。

城市音乐素质反映城市品质。希望今天星罗棋布的都市琴行在提升市民音乐素质、推动音乐文化产业、打造高品质的文化大都市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这样的安静而有穿透力的声音是多么抓人啊。在生活节奏飞快、浮躁喧嚣的现代社会中，依然能够帮助自己沉下心来静下来去聆听琴的声音，回归自己的内心，我想这就是古琴真正的魔力吧。

古琴另一个让人着迷之处



丫鬟打闹取乐、黛玉写诗结社——

所作的虽是惆怅的《桃花行》，但在春日里，基调有点回郁。随后便写了探春生日以及前 80 回大观园中最后一次的吟诗作词活动。

那一次，薛宝钗填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既是轻薄

红楼的风筝

戴萦袅

宝钗拿来一个“一连七个大雁”的风筝，而《南鹞北鸢考工志》残篇中提及曹雪芹曾制作一个由“富非所望不忧贫”七字串成的风筝。

放风筝是前 80 回中“一样机轴，两样笔墨”的重要情节，起承转合一气呵成。曹公先写贾府主子、亲戚、仆婢死的死、病的病、去的去，宝玉闷闷不乐，愁出一身病来，满是“晦气”。接着笔锋一转，写

丫鬟打闹取乐、黛玉写诗结社——所作的虽是惆怅的《桃花行》，但在春日里，基调有点回郁。随后便写了探春生日以及前 80 回大观园中最后一次的吟诗作词活动。

那一次，薛宝钗填了：“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既是轻薄

1972 年，我中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古籍书店工作，非常开心。去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书堆得像山一样高，我攀上了高高的书山的巅峰……

上海古籍书店开创于 1956 年，十年动乱初期，古籍书店被迫停止了大部分业务活动，但仍然坚持收购古籍、碑帖、字画，为国家抢救和保护了大批图书、文物。如宋刻本《咸淳临安志》、明刻本《虞台輿图要览》、明成化刻本说唱词话、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等数十种孤本、珍本、善本的发现，以及大批明清、近代书画作品和许多珍贵碑帖的收购，正是古籍书店职工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要贡献。

“四人帮”被打倒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古籍书店职工夜以继日地投入整理古籍的工作中，将一批批古书分门别类地标价出售。那时读书人还处于“书荒”后的“饥饿”中，每天都有许多人排队购书。有些读者没能买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书籍，我就为他们做好缺书登记，一旦有了就及时通知他们。

有一次，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从杨树浦走到福州路，就是为了买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练习书法，但排队轮到他已经买完了。他失望地看着我，恳切地对我说：“谢谢你替我找一本《玄秘塔碑》好吗？我实在太需要它了！”我接过那少年手中被汗水浸湿的四枚 5 分钱硬币，心里特感动。我叫他等等，就走进门市部后面的小栈房，替他找了一本留存的《玄秘塔碑》，定价 0.2 元。看着他得到那本碑帖时高兴的样子，我真正感到作为一个古籍书店职工的光荣。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作为上海古籍书店的收购员，为了收购古籍、碑帖、字画，经常去济南、太原、沈阳、西安、郑州、洛阳、开封、武汉、九江、南京、苏州、杭州、绍兴等地出差。当时的条件，出行再远也不可能乘飞机，都是坐火车、汽车或轮船。在漫漫的旅途中，我总是手不释卷，虽苦犹乐。

我认识到自己收购古书、抢救文物工作的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因而十分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了不使珍本、善本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我发奋自学古籍版本目录学，经常求教熟悉业务的老同志，并登门请教顾廷龙、潘景郑、吕振白等一流的版本学专家，使自己的版本知识日益丰富，为日后整理、研究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奇，流水的洒脱不羁，欸乃的清冷孤寂，忆故人的情深意重，洞庭秋思的笃厚温暖，每一首曲子都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等听得懂的人去听。古琴记谱法与西方音乐严谨的记谱方式不同，更多的只是为弹奏者提供了一个框架，留给弹奏者二次创作的空间极大。根据弹奏者的性格和曲目理解的不同，同一个曲子也可能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

记得刚开始习琴，常被批评“机械”、“弹出来的东西没有线条感”，那时始终不得其解。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看人画梅花，在那毛笔走动的瞬间顿悟到什么是“线条感”、什么是“气韵生动”，很有些醍醐灌顶的感觉。之后，慢慢体悟到弹琴与书法、诗词、戏曲、气功的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我

们这些接受国外教育的人来说，那些离我们很远的东西突然以这样的方式鲜活了起来，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不纸上空谈，细细体味每一个吟揉绰注的指法，真真实实地从每一个音符、每一首曲子的弹奏中感受到古琴的神韵，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那实在是一种无法言表的，只有弹琴的人才能体会到的美！

习琴这些年中也有幸给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做过讲座，介绍过古琴的相关知识。现在每去一个城市，都会找当地的琴友切磋。围绕古琴总有说不尽的话题，真是海内存知己。感谢有缘遇到古琴，遇到的良师益友们，感谢古琴给我的不一样的生活。

柳絮骑凤飞升的写照，又与风筝的特性暗合。而林黛玉体弱多病，填了一首缠绵凄婉的唐多令，大家要替她放放晦气，于是一起放风筝。

放风筝似乎是冥冥之中注定的，这次聚会后，大家便各奔东西，或是在检抄大观园的浩劫中黯然被逐，或是在屈辱的婚姻中备受折磨，或是回家煎熬度日，都如同风筝般飘摇而去，生活孤苦无依，因此这里的放风筝似乎含有对命运的暗示。

尤其是林黛玉的那一句“我的风筝也放去了……我也要歇歇去了。”以及宝钗的那句“且等我们放了去，大家好散。”竟然一语成讖。

曹公本是制鸢高手，富贵闲人，也是落魄后亦能苦中作乐的人，他笔下的贵族生活，哪怕是放风筝，也是繁华中透着细致，奢靡里充满情趣，还能喜中藏悲，教人焉得不唏嘘。

1972 年，我中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古籍书店工作，非常开心。去报到的前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许多书堆得像山一样高，我攀上了高高的书山的巅峰……

上海古籍书店开创于 1956 年，十年动乱初期，古籍书店被迫停止了大部分业务活动，但仍然坚持收购古籍、碑帖、字画，为国家抢救和保护了大批图书、文物。如宋刻本《咸淳临安志》、明刻本《虞台輿图要览》、明成化刻本说唱词话、戚蓼生序本《石头记》等数十种孤本、珍本、善本的发现，以及大批明清、近代书画作品和许多珍贵碑帖的收购，正是古籍书店职工在特殊历史条件下作出的重要贡献。

“四人帮”被打倒后，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促使古籍书店职工夜以继日地投入整理古籍的工作中，将一批批古书分门别类地标价出售。那时读书人还处于“书荒”后的“饥饿”中，每天都有许多人排队购书。有些读者没能买到自己梦寐以求的书籍，我就为他们做好缺书登记，一旦有了就及时通知他们。

有一次，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从杨树浦走到福州路，就是为了买一本柳公权的《玄秘塔碑》练习书法，但排队轮到他已经买完了。他失望地看着我，恳切地对我说：“谢谢你替我找一本《玄秘塔碑》好吗？我实在太需要它了！”我接过那少年手中被汗水浸湿的四枚 5 分钱硬币，心里特感动。我叫他等等，就走进门市部后面的小栈房，替他找了一本留存的《玄秘塔碑》，定价 0.2 元。看着他得到那本碑帖时高兴的样子，我真正感到作为一个古籍书店职工的光荣。

上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我作为上海古籍书店的收购员，为了收购古籍、碑帖、字画，经常去济南、太原、沈阳、西安、郑州、洛阳、开封、武汉、九江、南京、苏州、杭州、绍兴等地出差。当时的条件，出行再远也不可能乘飞机，都是坐火车、汽车或轮船。在漫漫的旅途中，我总是手不释卷，虽苦犹乐。

我认识到自己收购古书、抢救文物工作的意义深远，责任重大，因而十分热爱自己的本职工作。为了不使珍本、善本从自己眼皮底下溜走，我发奋自学古籍版本目录学，经常求教熟悉业务的老同志，并登门请教顾廷龙、潘景郑、吕振白等一流的版本学专家，使自己的版本知识日益丰富，为日后整理、研究古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奇，流水的洒脱不羁，欸乃的清冷孤寂，忆故人的情深意重，洞庭秋思的笃厚温暖，每一首曲子都在讲述一个古老的故事，等听得懂的人去听。古琴记谱法与西方音乐严谨的记谱方式不同，更多的只是为弹奏者提供了一个框架，留给弹奏者二次创作的空间极大。根据弹奏者的性格和曲目理解的不同，同一个曲子也可能被呈现出完全不同的风格。

记得刚开始习琴，常被批评“机械”、“弹出来的东西没有线条感”，那时始终不得其解。有一次偶然的机会看人画梅花，在那毛笔走动的瞬间顿悟到什么是“线条感”、什么是“气韵生动”，很有些醍醐灌顶的感觉。之后，慢慢体悟到弹琴与书法、诗词、戏曲、气功的异曲同工之妙。对于我

们这些接受国外教育的人来说，那些离我们很远的东西突然以这样的方式鲜活了起来，实在是一件奇妙的事情。不纸上空谈，细细体味每一个吟揉绰注的指法，真真实实地从每一个音符、每一首曲子的弹奏中感受到古琴的神韵，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之美。那实在是一种无法言表的，只有弹琴的人才能体会到的美！

习琴这些年中也有幸给一些有兴趣的朋友做过讲座，介绍过古琴的相关知识。现在每去一个城市，都会找当地的琴友切磋。围绕古琴总有说不尽的话题，真是海内存知己。感谢有缘遇到古琴，遇到的良师益友们，感谢古琴给我的不一样的生活。

吴景略是虞山派的代表人物，桃李满天下。

十日谈

幽幽七弦情

我与古籍书店

罗伟国